



国外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研究丛书
Foreign Studies on Marxism and Socialism Series
徐崇温 主编

社会主义的未来

A Future For Socialism
John E. Roemer

[美] 约翰·罗默◎著

余文烈等◎译

张金鉴◎校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国外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研究丛书
Foreign Studies on Marxism and Socialism Series
徐崇温 主编

社会主义的未来

A Future For Socialism

John E. Roemer

[美] 约翰·罗默◎著

余文烈等◎译

张金鉴◎校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D033.4

L956.02

A Future For Socialism by John E.Roemer
Copyright © 1994 by John E.Roemer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09
by Chongqing Publishing Group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简体中文版根据美国哈佛大学出版社 1994 年版译出,重庆出版社在中国大陆地区独家出版发行。未经出版者书面许可,本书的任何部分不得以任何形式抄袭、节录和翻印。

版贸核渝字(2006)第 16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社会主义的未来 / [美] 约翰·罗默(Roemer, J.E.) 著;
余文烈等译. — 重庆: 重庆出版社, 1997.9 (2010.3 再版)
(国外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研究丛书)
ISBN 978-7-5366-3625-5

I. ①社… II. ①约… ②余… III. ①社会主义—研究 IV. ①D033.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232882 号

社会主义的未来

SHEHUI ZHUYI DE WEILAI

徐崇温 主编

[美] 约翰·罗默 著 余文烈等 译

出 版 人: 罗小卫

责任编辑: 吴立平 秦 琥

责任校对: 李小君

装帧设计: 重庆出版集团艺术设计有限公司·蒋忠智



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
重 庆 出 版 社

重庆长江二路 205 号 邮政编码: 400016 <http://www.cqph.com>

重庆出版集团艺术设计有限公司制版

重庆市伟业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

E-MAIL: fxchu@cqph.com 邮购电话: 023-68809452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787 mm × 1 092 mm 1/16 印张: 12 字数: 164 千

1997 年 9 月第 1 版 2010 年 3 月第 2 版第 2 次印刷

印数: 3 001 ~ 5 000 册

ISBN 978-7-5366-3625-5

定价: 25.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 023-68706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者简介

约翰·罗默，1945年生，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曾任加州大学戴维斯学院经济学教授，“经济、正义与社会”研究中心负责人，现为耶鲁大学经济学与政治学教授，是“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流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其教学与研究领域主要是：分配公正的经济学、马克思经济理论、最优化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主要著作有：《马克思经济理论的分析基础》、《剥削与阶级的一般理论》、《在自由中丧失——马克思主义经济哲学导论》。苏联、东欧剧变后，他坚持为社会主义辩护，并运用经济模式构造未来社会主义的蓝图，写下了这部《社会主义的未来》。

译者简介

余文烈，经济学教授、哲学研究员，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室主任，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现为深圳市委党校教授，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副会长。曾受聘比利时鲁汶大学、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等院校客座教授或访问教授。主持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3项，出版专著和译著《市场社会主义：历史、理论与模式》等6部，发表中、英文论文160余篇。

张金鉴，中国社会科学院译审，发表译著《震撼世界的六年》等12部共400余万字。

在研究当代各种思潮中 发展马克思主义

——为《国外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研究丛书》的出版而作

徐崇温

党的十三大指出,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从学到实践、从一国到多国、从建设到改革的发展,“都是对社会主义再认识的扩展和深化,都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同各国实践和时代发展的结合”;指出“马克思主义需要有新的大发展,这是现时代的大趋势”。

要适应这样的大趋势,我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就必须在研究实践的同时,研究当代各种思潮。就是说,必须在积极探索解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全面改革中的新问题,探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规律的同时,研究当代世界的新变化,研究当代各种思潮,批判地吸取和概括各门科学发展的最新成果。

为了发展马克思主义,为什么必须在研究实践的同时,还要研究当代各种思潮?

这是由马克思主义的本质所决定的,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在过去,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赢得世界历史性的意义,就是因为它是在吸取和改造两千多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中形成起来的;在今天,在世界发生着巨大变化,人类对自然、社会历史和人的思维本身的认识日益深化,并且在新的探索中,提出种种新的学说、新的思想、新的理论、新的观念的时候,研究当代各种思潮,吸取和改造其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就显然有

助于马克思主义的发展。

即使是资产阶级思潮,尽管它们大多以现代唯心主义的歪曲形式出现,却毕竟在这种形式下,提出了一系列真正由实践产生的问题,一些实际的、迫切的科学问题。把这些问题当做正面考察的对象,纳入马克思主义的视野,从中引出应有的结论,可以使马克思主义紧紧把握时代和实践的脉搏,从新的实践中吸取思想营养。

在一场新的技术革命正在世界范围内兴起的现时代,对于马克思主义来说,研究当代各种思潮尤其具有迫切的重要意义,这是因为新的技术革命使得全球问题日益尖锐化,把人类生存的利益提到极其突出的地位,要求人们改变传统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以正确对待和解决这些问题。十分明显,必须深入研究围绕这些问题而展开的当代各种思潮,我们才能跟上时代和实践的足迹,开拓新视野,发展新观念,进入新境界。

而在当代各种思潮的研究中,对于那些研究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思潮、流派的考察,对于我们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宏伟事业来说,又具有特殊的意义:一是因为这些思潮、流派都以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为研究对象,二是因为它们又是在不同的社会历史条件和思想文化背景之下,以不同的哲学世界观为指导去进行这种研究的,课题的同一性和观点的多样性相统一,这就使这种考察可以更加直接地有助于我们在与当代各种思潮的交流和撞击中,全面准确地把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神,破除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理解和附加到马克思主义名义下的错误观点,并结合亿万人民的实践,把马克思主义推向前进。

以马克思的哲学世界观为例,长时期以来,人们对这个问题一直进行着热烈的讨论: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把世界看成是一个只按自己的规律运转,而同人的实践没有干系的体系,认为马

对客观世界的改变,看成是认识的基础;而“西方马克思主义”人本主义思潮各流派则认为,世界是通过主体而得到中介的。因而,在马克思那里,不是物质的抽象,而是社会实践的具体性,才是唯物主义理论的真正对象和基础。

在这些不同思潮的撞击中去研究和把握马克思著作的精神,我们便不难发现,马克思的哲学世界观具有两个基本点:一方面,是把实践引进了本体论,强调也要从主观方面去理解事物,即把事物当做人的感性活动、当做实践去理解,强调人类连续不断的感性活动,是现存感性世界的深刻基础;另一方面,则是始终坚持外部自然界的优先地位,始终坚持劳动实践在多种层次上所受的自然制约性。

马克思哲学世界观的这两个基本点是相互联结、不可分割的。然而,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虽然强调了它的第二个基本点,即外部自然界的优先地位,却忽略了它的第一个基本点,即从主观方面把事物当做实践去理解,这就很难同旧唯物主义完全划清界限,这种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充其量只是一种片面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反之,“西方马克思主义”人本主义思潮各流派虽然突出了马克思哲学世界观的第一个基本点,却又忽略乃至否定了它的第二个基本点,所以,尽管它们再三声称要纠正苏联模式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缺陷,但在实际上,却只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了一个和苏联模式方向相反的歪曲,这样那样地陷入了唯心主义。

所以,从当代各种思潮的交流和撞击中,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还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人本主义思潮各派的哲学,它们都没有从上述两个基本点的联结上去把握马克思的哲学世界观,因而在不同程度上成为对马克思主义的附加成分,我们必须从中引出应有的经验教训,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程中,恢复马克思哲学世界观的本来面貌,并且根据当代 3

人类的实践去理解其深刻含意,把它推向前进。

《国外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研究丛书》就是根据这样的指导思想,在重庆出版社的大力支持下编辑出版的。

就这套丛书的覆盖面来说,它既包括东方的,又包括西方的,但鉴于长期以来,我们对于西方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研究,了解得较少,所以,在选材方面将以西方的研究为主。邓小平同志说过:“资本主义国家中一切要求社会进步的政治力量也在努力研究和宣传社会主义,努力为消灭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不公道、不合理现象直至实现社会主义革命而斗争。我们要向人民特别是青年介绍资本主义国家中进步和有益的东西,批判资本主义国家中反动和腐朽的东西。”(《邓小平文选》第154页)

就这套丛书的品种来说,既有对国外学者原著的翻译,又有我国学者对于国外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思潮、流派的研究和评述。但长期以来,我国读者接触国外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研究的原始材料太少,因此,这套丛书将以翻译国外原著为主,随着我国学者在这方面研究的广泛展开和逐步深入,而逐渐增加我国学者研究专著的比重。

这套丛书的编选,力求具有一定的开放性,就是说,一方面,我们将根据这套丛书的指导思想,挑选一定的翻译和写作书目,组织合适的译者和作者去完成以后分期分批出版。另一方面,我们又竭诚欢迎大家向我们推荐有关的书目、选题,包括推荐译者和作者,还竭诚欢迎大家对丛书中已经出版的作品提出批评和意见。

希望通过这些办法,把这套丛书真正办成一套比较能够反映我国广大读者的需要和要求,在全党全国建设一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队伍,在实践中学习和丰富马克思主义,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宏伟任务中,发挥一点促进作用的丛书。

中文第二版序言

股东的利益一致呢？曾经有多次努力试图解决这个问题，但公司的违法乱纪和腐败屡屡发生表明问题依然如故。既然社会主义的企业所有制更为分散，那么，社会主义为什么不会面临同样的问题，并且以更严重的形式出现呢？

古典主义的解决办法是把这些企业归国家所有。但这样做导致了許多错误。第一个错误是，政治家们不像公民们（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企业归公民所有）那样对管理企业具有兴趣。有许多这样的例子，政治家们让没有效率的企业继续运营，而不是把它们关闭，因为他们不愿意面对涉及把大批工人撤换的动荡。但是如果企业活力是经济增长的关键，旧的企业就必须不断地死亡，新的企业不断地诞生。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怎样才能达到这种境况呢？有的国家由于具有灵活的劳动市场，似乎已经非常接近这种境况，丹麦就是这样。在丹麦，解雇被雇佣者几乎不受任何限制，但被解雇的工人有强大的福利国家的支持。与此同时，国家举办强有力的再培训项目，用新的技能武装被解雇的工人，以便使他们在劳动市场具有竞争力。直至最近的金融危机，丹麦的失业率仍在 2% 以下，这是一项伟大的成就。在丹麦，企业是私人所有，而且国家允许存在一个相对不受控制的劳动市场，以促进“创造性破坏”的进程，而工人却不会受到这个动力系统的伤害。

我在《社会主义的未来》一书中介绍了一种作为约束企业经理方法的股票市场。我试图用这种方法防止某些个体公民通过不许别人出售他们的股票换现来控制企业。人们可以出售自己的股票换取别的股票，但不许把自己的股票完全抛掉。在一个人生命结束的时候，他的全部股票将转归财政部；一个人在成年时将收到一份股票财产，这份财产代表着他在这个国家所具有的企业财产份额。企业像日本所做的那样由银行监管。我在上述书中指出，这

的交流。

自 20 世纪 90 年代初撰写上述著作以后,我的想法有所改变,要点如下:我曾坚持认为,设计一种在公民中确保相当公平地分配企业利润的机制是可能的(或者通过国家财政部这样做,向公民提供公共产品,或者通过私人红利);这种情况能够世代相传,这样,任何实质性收入差别的唯一根源将只是工资。此外我还曾坚持认为,这是能够做到的,不管覆盖的人数是多是少。现在,我将从两个方面远离这种观点。

第一点是,从最近出版的皮克蒂(Piketty)和萨埃斯(Saez)的著作(2006 年)中我们知道,美国 0.1% 最富有家庭的主要收入来源已不再是资本收入(包括利润、利息和租金),而是劳动收入。这些人是明星运动员、大公司总裁和电影明星。他们的薪水极高。由此看来,现在劳动收入是收入不平等的一个主要根源,这同一个世纪以前是不一样的。因此,为取得社会主义者期盼的一定程度的平等,简单地在平等的基础上重新分配利润收入是不够的。人们必须重视减少劳动收入差异的政策。这方面的一项主要政策是教育,要强调对来自条件不好的家庭的孩子的极为强化的教育。这些孩子必须在劳动市场上对技能劳动和技能职业具有竞争力。这方面的第二项政策是对高收入者课以重税。高收入是由市场决定的,譬如电影明星和运动员明星的收入。他们不是市场失灵的例子,而是市场成功的例子。粗略地说,这些明星们取得了他们的边际产量。总裁们的高收入也可以这样看。如果一家公司每年有几十亿美元的销售收入,最佳的总裁每年能比能力稍次的总裁使这个数目增加 1 亿美元(最低预计);有竞争力的企业劳动市场将使这样的总裁的年薪也许达到 5 000 万美元。如此高的总裁年薪并不一定是市场失灵的信号,而是市场运行良好的信号。这种情况的对应办法是征收高额工资税。这样做并不会降低这种岗位所需

的高才能劳动力的供应。因为,除了总裁这样的工作外,这些人还能干什么?坐在自家的游泳池边读小说么?不大可能。这种高工资是竞争性工资的例子,它给这些人的巨大剩余超出了他们为从事其工作所必要的支出。这些剩余应该征税,并由国家重新分配。

我改变想法的第二点是关于设计一种稳定的社会主义社会而又不改变人们的偏好和价值观是否可能的问题——这里所说的社会主义社会指的是,在这种社会里,公民们的物质条件大体上是平等的。如果人们是自私和贪婪的,那就没有什么规则体系不能被规避。我们已经从最近的资本主义危机中看到这一点——从安然公司(Enron)、美国长期资本管理公司(Long Term Capital Management)和保险企业美国国际集团(AIG)到当前的全球金融危机。这些危机是那些贪婪的人或者歪曲或者破坏上述规则的结果。我的论点是,一套套的规则没有不能被破坏的。金融资本家是资本家阶级中最强大的成员:你能想象,他们会乖乖地听从那些低等的政府官僚们的管理吗?简直不可能,胳膊是扭不过大腿的。设计条规防止下一次金融危机的希望只是空想。新的条规也许能够防止与当前危机完全一样的危机,但接着一种新类型的危机将会出现,它将会规避新制订的条规。从这种意义上说,经济理论承诺的太多了:因为它一直承诺设计出将使甚至是自私自利和贪婪的人也以社会利益行事的规则。我认为唯一的希望是改造人。

因此,为了社会主义的稳定,公民们发展一定程度的团结——这是一种社会主义精神——就变得必要的了。然而作为马克思主义者,我们不能希望通过让人民阅读小红书就能改造人;阅读小红书在一定程度上对改造人有帮助,但还远远不够。如果我们是唯物主义者,那么我们就相信,物质条件必然引发人们变得更加团结。换句话说,我们必须去发现社会团结的运动规律。

4 我认为,社会团结已经在北欧国家(瑞典、丹麦、挪威和芬兰)

发展起来,而这就是为什么这些国家非常平等的收入分配甚为稳定的原因。现在有人可能会回答,而且是悲观地回答说,这些国家是特殊的:这些国家都是小国,而且在人种、语言和宗教方面(或者在它们的福利国家发展期间)是同质的。许多人争论说,这种同质性直接产生了公民们的团结,而这种团结正是这些国家大规模实施福利国家的根源。但我认为,这些国家实施福利国家的机制可能不是这样。同质性意味着公民们面临着非常相似的风险。他们具有相似的教育水平和生活风格,因而面临着相似的失业和疾病的风险。当一个民族面临着同质性风险时,设计一种普遍的每一个人都愿意投票赞成的保险政策在政治上是容易的,人们之所以赞成,纯粹出自个人利益的考虑。我相信,正是这种风险同质性使这些国家的福利保障制度开始起步。一旦初期的社会保障计划得以实施,我认为人们的价值观就发生变化:他们逐渐喜欢伴随社会保障的条件的平等。他们的平等偏好改变了。换句话说,他们发展了团结,而这种团结又使他们进一步扩大福利国家的程度。因此今天,这些国家的政府在这些国家征收差不多相当于一半的国内生产总值的税收。这是我提出的团结出现的运动规律。

欧洲还存在着另一个使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面临的风险同质化的因素:第二次世界大战。就危险而论,这场战争毁灭了巨额财富,使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处于相似的困境。二战一结束,欧洲就立即大规模地发展福利国家,这不是一种巧合。当然,大萧条也使美国的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风险同质化——大萧条卷走了工作和财富,因而产生了社会保障法,该法案于1935年获得通过。

如果这种推测是正确的话,那么发展一个大量重新分配财富的福利国家的关键就不是种族和文化的同质性本身,而是所面临的风险的同质性。在像中国这样的国家,存在着很大的异质性:最重要的例子是农民和城市居民的区别,他们在教育、文化方面是异



质的,因而风险异质。我认为,在没有发生一次关于面对风险方面使居民同质化的危机以前,中国不会发生重大程度的财富再分配,或者发展成一个高水平的福利国家。这种危机可能是一次大的经济衰退。(很明显,我们希望这种危机不是一场大的战争。)在此以前,我不相信大规模重新分配财富的压力将会存在。今天,中国的富人阶级变得强大得多了,而且他们将抵制高程度地重新分配财富。财富的重新分配只能由一场市民运动来完成。不幸的是,历史告诉我们:没有几次危机和大规模的市民组织,这种重新分配财富的事件是不会发生的。中国曾如此多地打破历史纪录,在这个问题上可能会给我们一个惊奇,也打破这个历史纪录,设计一个高水平的福利国家而不通过大规模的阶级斗争。但是我怀疑这种事情发生的可能性。

中译者序

(一)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社会主义运动史上发生了震惊世界的苏联东欧剧变,接踵而来的是国有资产私有化的浪潮,一时间乌云滚滚,风雨满城。资产阶级的宣传机器大肆宣扬“社会主义已彻底失败”,“共产主义已被埋葬”,“马克思主义已经破产”,甚嚣尘上。生活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曾经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有所追求的左派们对眼前的波折深感困惑,一些对资本主义制度不满并对社会主义有所同情的普通群众也感到迷惘。然而社会主义的潮流是会被遏阻的。时隔不久,西方的左翼理论家们经过一度沉默之后又开始活跃起来,社会主义成为这批理论家的热门话题,他们尤其热衷于重新建构市场社会主义的未来蓝图。

1993 年前后,欧美左翼理论家掀起了当代市场社会主义的新辩论,形成了一股史无前例的热潮。不少报刊纷纷发表文章,各种各样的“市场社会主义”未来模式被详细地描述出来。这股热潮的部分成果凝聚在巴德汉和罗默主编的《市场社会主义:当前的辩论》一书中。而这股热潮所孕育出来的一颗明珠,就是罗默的这部著作《社会主义的未来》。该书正式出版之前,罗默曾把它两次打印出来,发给世界各地的同行,广泛征求意见,并三易其稿,最后才于 1994 年由美国哈佛大学和英国新左派书社同时出版。这本薄薄的小册子的出版很快在欧美理论界引起轰动效应,给一大批左

1



派以鼓舞,给迷惘中的群众以新希望,赞誉声络绎不绝:

《社会主义的未来》是“反复推敲的,完全可以实现的,尤其是令人信服的”(塞缪尔·鲍尔斯)。

“对那些有兴趣重新思考社会主义工程的基础的人,对那些对财产关系形式和经济制度之间的关系有更浓厚学术兴趣的人,《社会主义的未来》是必不可少的读物。”(E. O. 赖特)

罗默坚持认为,“社会主义没有死亡,她所需要的只是加以现代化。”他试图向人们展示,实现社会主义者的“最大愿望”——平等主义这个目标的社会形式就是“民主的市场社会主义”。

(二)

所谓市场社会主义(Market Socialism),按照美国《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1987年版)的定义是:“市场社会主义是一种经济体制的理论概念(或模式),在这种经济体制中,生产资料公有或集体所有,而资源配置则遵循市场(包括产品市场、劳动市场和资本市场)规律。”这就是说,市场社会主义既不同于以美国为代表的“市场资本主义”,又区别于以苏联为代表的“计划社会主义”。它具有生产资料公有或集体所有这一社会主义的主要特征,但又利用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手段。

不过,不同理论家对市场社会主义的界定各有不同。例如,美国著名经济学家保罗·格雷戈里(P. R. Gregory)和斯图雷特(R. C. Stuart)按照所有制、决策机制、调节机制和激励机制四个要素,把市场社会主义定义为“生产要素的公共所有制为特征的经济体制,决策采取分权制并通过市场机制加以调节,兼用物质鼓励和精神鼓励来推动参与者实现这一体制的目标”。英国的市场社会主义

为运用市场来实现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市场社会主义。林德布洛姆(Charls E. Lindblom)曾任美国比较经济学会主席,他以消费者主权和生产者主权作为划分标准,把市场社会主义定义为公有制加消费者偏好的混合型市场导向制度,即“市场取向的社会主义”。可以看出,尽管这些定义关注的要素有多有少,各自的侧重点也不尽相同,但都离不开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和利用市场进行资源配置。因此,上述《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的定义是较有代表性的。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市场社会主义的历史上,不同时期对公有制和利用市场的程度的侧重点是大不相同的。

市场社会主义的理论源远流长。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意大利经济学家帕累托(V. F. D. Parato)发展起来的现代福利经济学可以说是市场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帕累托认为市场机制和计划机制均能达到“帕累托最优状况”即“最有经济效率状态”,这种思想已经隐含了一种新的经济理论萌芽:资源的有效配置并不取决于社会制度的性质。因此帕累托有“资产阶级的卡尔·马克思”之称。此后,巴罗内(E. Barone)1908年发表的《集体主义国家的生产部》,第一次具体系统地论证了社会主义条件下资源最优配置的可行性。接着,美国经济学家泰勒(F. Taylor)在1929年发表了《社会主义国家的生产指导》,首先阐述了计划模拟市场的“试错法”的思想。1933年,英国经济学家迪金森(H. D. Dickinson)发表《社会主义社会中价格的形成》,确定了测算社会主义经济达到一般均衡的价格的可能性。在探讨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的前驱者中,波兰著名经济学家、政治学家和外交家奥斯卡·兰格(Oskar Lange)当推其中的佼佼者。关于兰格的市场社会主义理论和对当代社会主义经济关系的研究颇具影响的“兰格模式”,罗默在本书中有详细的讨论。

这样,以米塞斯(L. Mises)、哈耶克(F. Hayek)、罗宾斯为一方 3